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

2016年12月，第20期，頁1-26

## 我國教育政策智庫之定位與角色分析： 以國家教育研究院為例

陳榮政 劉品萱

### 摘 要

由於受到新管理主義（new managerialism）影響，許多國家在政治、經濟、教育體系等各面向，莫不呼應此趨勢調整，為提升公共行政效能，不僅重視績效責任且考量不同聲音作為決策參考，因此政府部門對於政策制定的完整性與效能性需求更勝以往，在教育政策實施、行政管理革新到學校課程亦是如此。有鑑於此，本文先從教育行政視角切入，理出社會參與以及科學化基礎的教育政策決策已成為教育行政機關的趨勢，突顯教育政策智庫扮演行政機關和政策產出之重要媒介的角色，基於此前提，本研究希冀透過專家學者與相關政策關係人的深度訪談內容，理解我國具指標性的教育政策智庫——國家教育研究院之定位與角色及其所產生之政策分析與影響，並探討教育行政機關與教育政策智庫之間之互動模式，分析我國現行教育智庫實務運作。

**關鍵字：**教育智庫、教育行政、教育政策、新管理主義

---

陳榮政【通訊作者】：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電子信箱：robin@nccu.edu.tw

劉品萱：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生。電子信箱：rina05270527@gmail.com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Evaluation  
December, 2016, Vol. 20, pp1-26

# **The Role and Identity of Educational Policy Think Tank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Jung-Cheng Robin Chen

Pin-Hsuan Liu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trend of the latest wave of public service reform, focusing on the rise of educational think, influenced by new managerialism. In recent years, many states have been through the social economical changes and have impact on education, resulting in various stakeholders getting involved in education policy making. With tha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Due to the need of scientific evidence before making any education policy, th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educational think tanks has become the spotlight in education decision making. The paper was conducted with a qualitative method through the use of in-depth interviews, based on the main official education think tank in Taiwan---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o evaluate its policy influence and planning.

**Key words:** educational think tank,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policy, new managerialism

Robin J. Chen B.A., M.S.,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robin@nccu.edu.tw

Pin-Hsuan Liu. Master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rina05270527@gmail.com

## 壹、緒論

21 世紀的國家發展，由於受到新管理主義(new managerialism)影響，西方與亞洲主要國家在政治、經濟、教育體系等各面向，莫不呼應這股國家在公共行政服務上角色調整的呼聲，在政府的教育政策實施、行政管理革新到學校課程改革，不僅引進企業管理模式概念至教育行政部門，公民組織參與(civic engagement)決策的形式日益被重視，形成教育行政部門結構的扁平化(Lewison, 2013)。此波改革，主要降低政府部門對於公共事務之干預，為提升公共行政效能不僅引進私部門精神，以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的價值形成制度性的檢視基礎，並且考量不同的聲音成為決策參考。在全球化所帶動的連串影響並限縮政府功能下，第三部門或非政府組織的角色逐漸吃重，然而教育決策過程中，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如何適度融入社會的多元參與是本研究思考的起點。

聯合國大會於 2002 年底，宣布啟動 2005-2014 年為永續教育發展十年計劃(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SD)，透過整合原則，將永續教育發展價值觀融入教育和學習體系，並同時結合經濟發展、社會正義和保護自然環境等議題(UNESCO, 2011)。計畫內容希望透過政府、議會、非政府組織、媒體、私營部門、教育機構、研究機構等不同角色的合作，共同來推動永續教育發展十年計劃。本研究認為，擴大行政部門在決策時的參與層面，並引進更多的決策參考資源已在上述的風潮下逐漸成為常態，但如何可以進入決策？以及以何種方式影響決策？至今仍有莫衷一是的見解與看法。以教育政治學的立場來看，藉由科學的方式蒐集和分析人民的聲音(voice of people)，除了契合民主制度的運作，另一方面也呼應新管理主義(new managerialism)擴大決策參與公私合作的精神(Jacobsen, 2009)。但科學的方式定義為何？何種分析才能取信於民？本研究認為西方國家行之有年的智庫制度，正可為此需求立下註腳。

而作為我國教育研究工作的最高專責機構之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教院），其角色不僅是整體性、系統性的教育研究智庫，也負有教學研發、培育教育教育行政管理人才等任務。作為我國國家級教育政策「智庫」的國教院，其功能係以研究的角度對未來可能面對的教育問題提早因應處理，或完善相關政策之全面性，如相關針對課綱制定所產生之不同社會觀點，國教院即可扮演更具積極之功能發揮期號召力使政策更臻完善，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我國教育政策智庫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在教育行政機構與智庫研究產出之間的互動性和關連性，依據 Thunert(2006)的研究，智庫縱然有其決定性角色的扮演，但也應該觀察若智庫所提政策建議不為行政

部門所採納時，行政部門又是以何種方式來進行後續？值此益發反應出教育政策智庫功能與運作模式研究的重要性。

## 貳、文獻探討

### 一、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之發展趨勢

#### (一) 教育行政之改革與變遷

Glatter(2014)分析自 1969 至 2014 年的教育行政發展變遷後指出，教育行政的研究和實施分別可從其「實用性」、「機構性」以及「改革性」等三方面的特性來進行探討。

##### 1. 教育行政應具備實用之目的

Funke(2013)指出，「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之研究在現代社會越來越受重視，除因其在人類活動中扮演中心的角色，且社會需要科學性支持，以了解並解決複雜的問題，並呼應世界相關的趨勢。以 OECD 所舉辦的國際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測驗計畫 (PISA) 為例，PISA 的排名一開始僅提供會員國的教育品質提供年度的綜合性報告，但現在報告已成為各方關注且具指標性的文件，不只反映各國教育狀況，亦提供世界教育整體的發展概況，將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與此國際測驗連結此舉，充分展現教育行政機關在問題解決的實用考量。

##### 2. 教育行政應展現機構之特性

現今世界各國已進入一個新的政策環境，Shiroma(2014)指出政策網絡 (policy networks) 中，媒體與專家學者已位居核心地位，不只侷限於國內的網絡互動，也滲入了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因此在教育行政機關的機構特性上，已展現出新的意涵，也就是融入社會參與、學者與國際趨勢。Guzman(2013)亦認為，預測未來趨勢已成為國際組織的一項重要功能，且國際組織儼然成為各國訊息交流之平台。因此，國際組織的相關政策或報告，對各國政策的研擬有重大之意涵，同時間亦應關照民間社會如何參與的公共政策的形成。許多國家教育系統的關注重點，從強調行政與政策，轉移至平台式合作的管理特性，即引進私部門之管理策略重構官僚體制及教育機構，也是新管理主義精神，強調可量化之產出及績效目標 (performance target) 的達成 (Peters, 2013)。

### 3.教育行政應拓展改革之功效

跨國經濟活動日益增加、區域組織興起的全球變遷潮流下，教育與政策的對話不再是傳統的以政府為中心的模式，而是在一個更開闊的平台，讓私部門、國際組織等聲音能相互交流，形成強有力的政策網絡(Shiroma, 2014)。由於新管理主義的影響，公私部門與政府的互動愈趨密切，政府角色由大政府(big government)轉變為小政府(minimal State)，全球化趨勢演變加上新型管理概念湧現，政府已漸顛覆傳統的階級體制角色，各組織、團體的勢力也開始影響政府的行政模式及策略。不只政府行政部門受影響，高等教育機構亦走向商業化及顧客導向(Cornish, Minichiello & Phuong, 2014)，另在學校行政機關中，Cornish 等人也提及，學校行政機關開始出現不同於傳統領導理論之概念與作為，如「分布式領導」(distributed leadership)，是一種共同領導、治理的形式已漸形成，並比傳統領導更注重夥伴、合作關係。因此，隨著新興管理型態概念的擴張，教育行政在各方面進行彈性調整，如政策制度、學校組織、課程等皆有轉變。

## (二) 教育政策制定內容之趨勢

政策是國家的方針，指引國家往特定方向前進，而教育是影響一國興衰的重要指標，為擬定具體可行的教育政策，過程中須參照多方意見，Moyo 與 Modiba(2013)指出，政策網絡的概念用於教育政策制定的管理機制，被視為「利益及利害相關者」(cluster of actors, each with an interest or stake)，即在參與政策制定之聯繫及互動機制，加入越來越多的非國家部門，如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等。歐洲網路及資訊安全局(Europea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Agency, ENISA)在 2010 年關於公私部門合作的報告書(Non-Paper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Europea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for Resilience)中即強調教育政策的形成過程，就像權力競逐，也就是多方勢力企圖以自身影響力，干預政策之制定，如智庫、媒體、專業協會、壓力團體等(Gerrard & Farrell, 2013)。政策之形成已不只是政府之意見，而須廣納各方想法，在權衡之下，做出適當之決策。論及政策制訂與施行之探討，Mishra(1977)指出在研究社會政策的相關實施時，有三種不同切入方式：一種是以現行政策實施進行理論的驗證和對話；一種是以跨國比較的方式進行對特定政策趨勢的分析；一種是將相關的政策置於更深的社會脈絡中進行探討。而教育政策的規劃和教育行政的革新，在應用的層面上與上述的三大切入方式應無二致，教育政策研究必須立基於可茲檢驗的理論上，亦必須在國際的視野和框架中進行趨勢的分析，更必須在當代社會情境發展的脈絡中進行檢視。



### (三) 教育政策研究的全球性趨勢

關於新管理主義相關議題之探討，透過智庫(think tank)的角色，新管理主義的思想較易對政策制訂者(policymaker)產生影響，也就是智庫做為一個較大的組織，具有較為強大之影響力，也往往成為新管理主義下的政策轉變之推動者(Cahill, 2013)。進一步探究新管理主義與教育政策之關係，Clarke(2012)指出，新自由主義與新管理主義對教育政策的影響，已是全球化現象，在大範圍的時空影響下，涉及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網絡關係，在這樣的全球性政策空間內，競爭及比較成為一大特點，績效責任、競爭、及民營化(privatization)成為政策關注的主要議題，而市場、管理主義及表現(performativity)也成為政策技術的關注要點，如何從重視「績效」的變革趨勢中思考教育行政的相關產出，便是需要客觀的研究資料及組織調查作為其後盾(Levin, 2010)。總結目前教育政策研究發展，我們可知曉，教育政策不只受到各國政治、社會、經濟之影響，也會受到全球脈絡之衝擊，在無法做出定奪時，仰賴的便是各方資訊、資料庫或相關團體之建議，或許此過程亦會受人非議，但政府與這些私部門或利益團體之互動，已是全球化影響下不可避免的趨勢。

## 二、教育政策智庫之發展與運用

### (一) 智庫定義

智庫是獨立於政府與大學的政策研究機構，屬於「非營利公共研究政策組織」(non-profit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Weaver & McGann, 2000)。Wiarda (2008)則認為智庫屬於一種研究機構，和一般高等教育機構的差別是，智庫既沒有學生，也不提供課程（不過會舉辦專題研討會和論壇形式之活動），著重於公共政策事務。另外，Wiarda 提到智庫是主要研究公共政策的機構，因此和政府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基於此，智庫應是一中立、自主性之機構，而研究人員多是特定學術或實務領域之專家，透過專業研究，提出政策分析與建議，以影響公共政策。根據智庫之性質，可分為以下三種類型(Weaver, 1989)：

1. 以研究為導向的機構

又稱沒有學生的大學(university without students)，多為大學的附屬機構，以當前政策議題為研究主軸，目標是長期性的影響並改變決策者的觀點。

2. 以接受委託研究為主的研究機構(the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政府機關委請智庫進行專案研究替某項政策方案的擬訂或分析政策執行的成效。

3. 倡導型智庫(advocacy tanks)

影響政府決策為主要目標，主要為改變或維持決策人士對於政策之看法。

## (二) 教育政策智庫之運作與功能

根據 Weaver(1989)歸納包括：(1)智庫是決策者政策理念的主要來源；(2)智庫是政府公共政策議題的評論者；(3)智庫評估政府的方案，檢視其運作效率與成果；(4)智庫廣納高級官員與專家的人才庫；(5)智庫是新聞媒體資料引述的權威來源。另外，賓州大學以下列指標作為評鑑智庫運作的依據，並據此作為全球排名的指標 (McGann, 2012)，指標內容如表 1。

表 1 評鑑智庫運作之指標

| 指標內容   |
|--|
| 1. 智庫領導素質及貢獻，包含有效地經營任務及計畫、動員需要的財力與人力資源去完成任務及監控品質。                  |
| 2. 智庫的工作人員的素質和聲譽，須具備能號召有經驗且能力佳的學者及有批判性思考的分析家之能力。                   |
| 3. 研究與分析的品質與名譽，必須有能力去生產高品質、嚴謹且政策導向的研究，而這些資訊都能讓政策制定者、媒體和公眾所獲得。      |
| 4. 有能力招聘和留住優秀的學者和分析家。  |
| 5. 學術表現與名聲。這涉及到進行研究相關的學術嚴謹性。                                       |
| 6. 品質、數量及出刊物的範圍。   |
| 7. 對政策制定者和其他政策行動者智庫研究和方案的影響，包含政策建議是否是考慮甚至最後被政策制定者、政策行動者和公民社會採用的機會。 |
| 8. 政策制定者的名聲。   |
| 9. 有明確承諾去生產獨立研究與分析，這包含了製造出嚴謹的研究證據及分析的能力與標準。                        |
| 10. 進入關鍵機構，包含接觸關鍵的群眾和政府官員。   |
| 11. 能夠召集主要政策制定者和制定與其他智庫及政策制定者有效的網絡和夥伴關係。                           |
| 12. 機構的產量。   |
| 13. 研究、政策建議等產物的利用率。  |
| 14. 在公民參與中的組織資訊、宣傳工作、立法或證詞、學術論文或演講、研究以及教學的有效性。                     |
| 15. 能夠使用電子、平面的媒體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與研究。                                     |

資料來源：整理自 McGann, J. (2012). *2012 Going to global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Philadelphia, P.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30).

由上述的指標來看，儘管並非單一限定在教育政策智庫，但是對於智庫的運作、應有的功能，以及相關的互動和使用等，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對於教育政策智庫如何有效的運作亦為重要依據。總結來說，智庫的組織行為是界於學術界與政策制度之間的中介組織的模式，不同智庫的類型雖有其側重面，設置目的皆以提供公共政策所需專業知識及改進公共政策為主，但不參與實際政策執行，而其提供政策建言的方式又與一般學術機構，它更強調向決策者溝通研究成果，確保研究能被其接收與理解。

### （三）教育行政機關與教育政策智庫之互動分析

目前各國家之教育智庫名稱不盡相同。中國大陸、美國及俄羅斯等國家強調其教育發展偏向於科學研究之性質而有「教育科學(education science)院」之稱呼；另有強調其教育智庫屬於國家層級之地位而冠以「國家教育研究院」之名稱，如我國、日本及新加坡等。而在英國及紐西蘭等國的教育智庫名稱中，常用「研究委員會」(committee)或「基金會」(foundation)，目的為凸顯地位之中立與組成之多元，而取名之。無論名稱為何，皆可見各國對於教育智庫發展之重視程度已提升，其設立目的與組織任務多是為強化教育研究與政策及實務的連結，藉由教育研究成果的傳播，提供決策者在進行教育政策規劃與改革的基礎，以促進教育的改進與發展。然而，因為教育研究具有研究領域的多元性、研究對象的複雜性、研究結果的實踐性與應用性等特性，以至於教育研究與應用之間的關係亦變得複雜與不容易。在具體的互動上，陳榮政和楊振昇（2013）研究以美國、英國和新加坡為例，歸類不同智庫與行政機關的互動方式：

#### 1. 隸屬教育部之美國國家教育科學院

美國國家教育科學研究院乃隸屬於教育部，是根據 2002 年國會通過的教育科學改革法案而成立，負責教育研究業務，致力推動教育研究之科學證據化，並受到國家教育科學委員會之諮詢與監督。

#### 2. 財團法人性質之英國國家教育研究基金會

英國國家教育研究基金會乃依據 1948 年公司法設立之非營利機構，主要是接受不同單位之委託，關注於孩童與青少年的成就表現、未來發展與其所接受到的社會福利服務，並希望透過研究成果提供學校領導者解決學校教育的發展之困境，其重要工作是將研究成果提供英國國家與地方層級之行政機構決定政策之參考依據並且有助於宣傳政策與改善實踐狀況。

#### 3. 教學與研究並重之新加坡國家教育研究院

新加坡國家教育研究院乃為附屬於南洋理工大學之獨立學院，然經費來



源則直接受教育部補助，其任務旨在肩負著研究與教學之任務，並擔負著新加坡師資培育的重責大任，每年約有二到三次定期與教育部相關單位召開會議，與教育部、南洋理工大學形成一種三合一的體制，因此在績效評估上，融合教學內涵與研究產出。

### 三、教育智庫之運作實例

#### (一) 芬蘭教育研究院(The Finnish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芬蘭教育研究院(The Finnish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以下簡稱 FIER)，為 1968 年於芬蘭約瓦史庫拉大學(the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所設立的一個含各種學科的教育研究中心，主要任務為教育研究、教育測量與教育發展等工作，其亦是芬蘭之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國家研究中心。其組織架構可分為董事會、主管、執行部門以及主要研究領域等四個部份，其中研究領域包含有：教育與工作環境的人性化資訊傳播科技研究、教育與社會變化研究、視導、教學與學習歷程研究、教育文化、教育系統以及學習成效評估比較研究。FIER 成立至今，累積廣泛的領域研究經驗和多種學科的研究方法，均使 FIER 成為芬蘭獨一無二且在國際上具重要地位之國家級的教育研究單位。每年，FIER 的團隊會參加相關領域的專題研討或討論會並發表期刊論文，舉辦工作團隊成員會議，或是接受專家委託的研究任務。各項活動與研究合作過程之成果的出版品是 FIER 重要的產出，截至目前，FIER 已發行上千本書籍與系列出版品 (FIER, 2014)。

#### (二) 法國國家教育研究院(L'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Pédagogique)

法國國家教育研究院(L'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Pédagogique，以下簡稱 INRP)，源自 19 世紀誕生的教育博物館(Musée pédagogique)，於 2012 年併入里昂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 supérieur, ENS)，扮演教育研究的重要角色。1879 年，當時教育部長費希(Jules Ferry)成立教育博物館，後於 1956 年成立國家教育院(Institut pédagogique national, IPN)，傳承博物館自 19 世紀來的歷史收藏品，同時，也是提供教師文獻、資訊與新穎教學法的組織。1970 年，該院一分為二，包括：國家教育文獻與研究機構(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et de la documentation pédagogique, INRDP)及法國現代教育技術局(Office français des techniques modernes d'éducation, OFRATÉME)，負責執掌教育技術。1976 年，將教育文獻功能獨立，並成立國家教育研究院與國家教育文獻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document pédagogique, CNDP)，接著於 1977 年分出國際教育研究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d'études pédagogique,

CIEP)，負責國際鑑定的業務。至今，國家教育研究院承襲雙重傳統，負責進行與發展教育研究，並成為教育文獻資源中心。近 20 年來，從 1993 年至 2000 年一月的政令(décret)陸續賦予其大學特質，因此，在國家教育部(Ministres chargé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 MEN)與高等教育及研究部(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de la recherche, MESR)的監督下，國家教育研究院被定義成為具行政特色的國家公立機構(INRP, 2014)。

而依上述內容對智庫所扮演之角色進行歸納，就實務面而言，以芬蘭與法國之智庫實例運作，可分為兩面向：一為學生端，如芬蘭主要任務係就學生學習能力與成就進行評量，透過教育研究與教育測驗提出相關計畫並有系統性的出版，不僅幫助學生了解學習成效亦能回饋至政策端；另一則為教師端，主要針對教師實務教學給予建議與協助，如法國國教院分為國家教育文獻與研究機構及法國現代教育技術局，分別提供教師文獻、資訊與新穎教學法等資源或支援，透過科學、技術、教育與培訓不斷更新教師認知以促進教學。因此，智庫除扮演政策的意見提供者角色外，於教育現場之實務面亦有其重要性，此運作方式及內容與我國目前之現況亦有其相似之處。

##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為探討教育政策智庫在教育行政實施與教育政策研究間所扮演的角色與定位，因此選擇以深入訪談法，藉由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且與實務相關人士直接對話的機會，增加對資料分析的敏銳度。Patton(2002)對於採取訪談的方法大致整理出四種形式：非正式對話訪談、訪談引導法、標準的開放性訪談、封閉式、固定反應的訪談。本研究認為這四種形式並非相互排斥，亦可交相應用，端賴訪談時的對象與現場氣氛而決定。訪談法的採用不僅是因為其屬質性研究工具一環，且是基於語言本身具備符號化溝通的優點，可成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有效媒介。藉由語言途徑將可深入了解研究對象的內在思維與信念。因此，深入訪談法不僅具第一手資料的特性，且可協助研究者理解研究背景與人物時，可藉著適當的語言溝通獲致正面的效果而增加研究效益。Denzin & Lincoln(2000)指出，愈來愈多的質性研究者認為，研究者所要建立的是一種關係式的，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共同建立的一種對話與結構式的內容，兩者關係為相互依賴的，因此過程中所產生互動是相互協調與認可下而成的。而在訪談對象的安排上，本研究訪談對象包含教育行政學者專家以及國家教育研究院主管，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本研究訪談登錄方式採以編

碼方式進行(表 2)，而每位訪談對象編碼後之數字分別代表受訪者訪談稿之頁數、與其受訪者訪談稿之該頁的行數，例如：A2-1-26、31，代表該段內容取自 A2 受訪者訪談稿中第 1 頁、第 26 及 31 行的內容。

表 2 受訪者一覽表

| 機構名稱    | 訪談對象   | 時間         | 代號 |
|---------|--------|------------|----|
| 國立大學    | 教育行政學者 | 2016/05/07 | S1 |
|         | 教育行政學者 | 2016/05/16 | S2 |
| 國家教育研究院 | 主管 1   | 2016/04/11 | A1 |
|         | 主管 2   | 2016/04/11 | A2 |
|         | 主管 3   | 2016/04/08 | B1 |
|         | 主管 4   | 2016/03/28 | B2 |
|         | 主管 5   | 2016/03/28 | B3 |

在質性研究的規準上，Lincoln 與 Guba(1985)提出五個重要的規準：確實性、轉移性、可靠性、確認性、真實性。以作為提昇質性研究信實度(trustworthiness)的判準。而潘慧玲(2004)列出若干具體做法，包括：研究者背景與立場的澄清、長期進駐田野、使用三角檢證法、運用參與者檢核、採用同儕審視、進行厚實敘寫、從事反例個案分析、使用外部查核。為建立研究的信實度，本研究以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的精神，以多元的方式進行資料分析，分別使用文件分析作為理論檢證、以深度訪談作為方法檢證、以及田野調查作為資料檢證。

## 伍、結果與討論

作為我國最高層級教育智庫的國家教育研究院，目前隸屬於教育部，屬於教育學術研究機構，負責研究教育制度、教育政策以及教育問題；研究發展課程教學、教科書、教育測驗等教育方法；編譯學術名詞、工具用書；推廣教育研究成果以及服務島內外教育學術交流等。然而，由於其成立之初係由三個機關（國立編譯館、國立教育資料館與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合併而成，因此組成母體的各子單位有其原有業務，故國教院尚需擔負著研究之外的教育服務任務，如教育人員之培訓及研習、學術名詞及工具用書編譯等，因此無法純然以研究機構運作。儘管如此，本研究經過上述文獻分析後，試以智庫本身定位、與教育行政機關互動、研究產出與教育行政之應用、以及國際化與競爭力四個面向探討此一國家級教育智庫之角色：

## 一、就智庫本身定位而言

### (一) 若隸屬官方位階應朝與部會平行方向努力

目前國教院隸屬教育部，為教育部的下屬單位，因此經費、預算主要亦來自教育部。此種隸屬方式，使國教院成為「教育部」的研究單位，而不是「國家級」的研究單位，若國教院成為教育部的行政支援單位，對於研究單位之獨立性要求勢必有所影響。因此，國教院若要以為國家級教育智庫自詡，最直接作法即為改隸，直接隸屬「行政院」或「總統府」為最佳方式。

若要提高國教院層級，應該在人員與預算上有一定的獨立性，如改隸於行政院與總統府。(A2-1-26、31)

現實與理想考量，經費應為優先考慮，因此還是附屬於政府組織是較適合，但附屬會牽涉到層級，到底是在教育部層級還是行政院，亦或是更高層級，如：中央研究院附屬總統府，理想上，若要讓智庫更為超然，可能把層級拉高會較合適。(S1-1-29~32)

然而，改隸之舉措雖立意理想，但實際情形尚有許多因素需考量，若國教院未來改隸「總統府」，由於目前隸屬於總統府底下已有一研究單位—中央研究院，若國教院併入中研院，會衍生研究人員之篩選標準不一的情形，以及原國教院內行政人員的去處與安排，均會是改隸之阻礙。

和中研院一樣隸屬總統府，雖立意理想，但可行性不高，因國教院負責功能不只研究，尚有其他單位因其歷史因素需從事行政工作，如：教育中心。(A2-3-1~4)

另一作法則是改隸「行政院」，提高國教院之層級以等同於教育部，若國教院層級提高，才能發表與教育部見解不同之政策進而與教育部提高互動，亦能提升研究人員職級，以增進研究人才在國教院與大學院校間的平行流動。然而，進一步衡量現況，行政院已於 101 年進行組織再造且精簡部門，故國教院若欲改隸於行政院，依訪談內容看來仍有難度。

若無法隸屬總統府，隸屬於行政院的話，國教院可成為行政院直接管轄二級單位（目前為三級單位），提升至二級，可發表與教育部有不同見解之相關教育報告書，如此才能進步。(A2-3-14~18)

改隸行政院相較來說較有難度，國教院等於會成部會層級，由於目前行

政院部會也以達精簡，故不可能將國教院改制至行政院隸屬機關，將來亦會面臨到院長與教育部長之職位接任問題。(A2-3-30~33)

由於目前受單一部會影響，使國教院發展受限，但若能在現有的組織上進行內部職能與結構化的調整，吸引優秀人才，亦不失為在無法突破先天政府結構組織下，可以調整的精進作為，並進而促進研究人才的流動。

提升層級、位階，才能吸引未來大學院校優秀人才，若未來中心主任改為十三職等，將來大學院校主任、院長會願意前往，整體才會提升。(A2-3-12~14)

## (二) 若考量趨勢應以財團法人形式運作

隸屬於政府部門固然有其好處，即經費來源固定，但由於台灣政體因素，部長的更迭容易引起國教院主其事者的連動變化，而使得行政力量干涉國教院的學術研究及研究的發表。因此除上述改隸之作法外，欲提升智庫之全球性與中立性獨立基金會亦是一種適合之方式。隨新公共管理思維興起，本由政府組織負責的公共事務紛紛轉型為財團法人或行政法人組織，以杜絕公務人員缺乏創新的心態，作為中立之教育智庫，若能朝法人化經營，能避免人治影響以保持其專業性。

基本上，要成為全球性的教育智庫，獨立的基金會形式較適合，像在英國的智庫都是屬於獨立基金會運作。(S1-1-6~7)

如以政策專業性和延續性，應朝向法人化或大學方式發展，畢竟大學定位不同(如：政策研究)，若能朝此方向發展，應盡量避免人治，雖無法完全避免，但可朝法治努力。(B2-2-20~22)

若要中立，應朝向法人化較客觀之方式，以我國國教院為立，其作為我國教育智庫，若教育政策智庫能增加其學術專業性、廣泛性，則研究之結果能中立的供不同執政黨加以執行。(B2-2-7~10)

由於財團法人之形式，其最主要形式即為基金，因此對於財務有其自主權，但原隸屬於政府組織之國教院若要轉型，如何開闢財源是一重大課題，相較於他國，我國企業對於教育之捐獻比例較低，且我國目前教育事務之經費均來自政府經費，故要轉型為財團法人，財務自主仍有難度。

基金會運作就要考慮經費來源，所以說我國和其他國家情形不同，國外許多國家都有很多捐贈，譬如許多企業家對教育有貢獻，如：Wallis。



(S1-1-12~13)

我認為行政法人、財團法人是值得思考之方向，院內曾思考過若轉型為行政法人，如何開闢財源，財團法人不是不可能，我們也可申請專案經費，若研究同仁積極向外爭取計畫經費，都可以增加院內收入。

(A2-6-20~21、27~29)

### (三) 財務自主將是最大的困難

一般來說，捐款與利息收入較能維持機構的自主性，機構之研究人員較能進行其認為重要的研究，而接受委託之研究案在研究議題的選擇上便會受到外部的引導，自主性自然較低。由於國教院隸屬教育部，故多數研究案是接受教育部委託進行，加上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分配，因此財務自主性低。也形成政治干預，使教育智庫之中立角色無法全然發揮。

現在教育部與國教院作案子，主持費部份，若用下售則無，補助亦無，只有委託和行政協助才能領主持費，教育部目前大多使用下售方式。

(B2-6-32~34)

由於經費皆來自教育部，若政策或想法與教育部有出入，我們經費來源要從何而來？由於經費和人力都掌握在教育部手中，故不可能和教育部對立。(A2-4-12~14)

因為附屬在政府機關下，難免會受到政府干預，因為經費來源無法獨立，智庫要成為超然立場難度相對會比較高。(S1-1-7~8)

舉例來說，參與國際測驗是各國能夠了解自己國家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及和他國交流教育經驗的機會，且為國家制定教育政策參考之工具，然而負責我國國際測驗事宜者—國教院，由於上述探討之經費無法自主的因素，使得推動參與各式國際測驗時阻礙重重。

教育部把國際測驗都放在國教院，台灣預計參與 2018 年的 TALIS 測驗，我們都報名好了，但至今對於此一重要的項目仍然沒有恆常性的經費，國教院得自己掏腰包做了。(B2-1-2、20)

## 二、就智庫與教育行政機關之互動而言

一般智庫除作為自由、非營利組織外，還具備下列六項特性，包括：(1)具備專

屬成員的長期性組織；(2)不負責政策執行；(3)成員具備專長，特別是政策科學方法；(4)政策導向，主要任務在改進公共政策的過程與內容；(5)主要的產出是政策與建議，這些單位以自身的出版品及其為該領域所提供的教育而自豪；(6)強調向決策人員溝通工作成果，確保所欲傳遞的訊息能為決策者接收及理解（王麗雲，2006）。故智庫是一專業性組織，透過研究以提出政策分析或建議，進而影響政策的制訂方向。

### （一）欠缺由中央到地方政策擬定與評估之輸送平台

檢視近 20 年來全球發展風潮，「去中心化」已成為教育行政的運作趨勢，即中央充分授權地方以進行相關教育行政之運作或改革，此趨勢正是新管理主義發展下的教育行政之變革，為因應此趨勢，中央與地方於政策制定上如何達到良好的雙向溝通，則需透過特定機制加以運作，而教育智庫正是將政策具體化之重要角色。衡中央與地方如何建立教育政策擬定與評估的平台，進行在新管理主義風潮下政策透明化與充分授權的價值中有效運作，以一主要機構(中央)向外擴散之(地方)研究分支機構的運作方式(如中國大陸現行之運作)，或可作為參考。

中國大陸除有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其在重點地區、城市，還有其所屬的所屬教育科學研究所（院），他的組織類似我們現在台灣每個縣市的教師輔導團，各個專門學科的輔導團是一樣的道理，期待透過一個機構或單位對老師專業進修做一些比較系統性的規畫，但是目前台灣做法比較借重是資深老師來做，這個連結目前在台灣是看不到的。(B1-2-12-19)

若中央與地方於政策制定未建立密切連結，易發生理想與現實產生衝突的現象，即政策之「應然」與執行之「實然」競合，如目前提倡行政減量與簡化統合視導之舉，由於相關概念各地仍存有落差導致各方期待莫衷一是，使政策面未能與執行面結合，形成各校執行狀況不一之亂象。因此未來，若能於校長、主任等教育人員的在職培訓過程，結合目前關切議題的研究，並提供政策端回饋，作為高層次決策之願景性、方向性參考，方能改善上述情形。

國教院目前負責全國中小學校長儲訓與在職進修，若未來可朝向將培訓與研究作結合之方向進行，即將各校長於第一線的執行狀況回饋至政策面作為參酌，例如：以現在提倡行政減量之舉，由於其為抽象概念，因此造成各縣市執行狀況不一，有些學校有校長遴選，有些是校長評鑑或校務評鑑，有些是兩者皆有，有些則是皆無，理論上，應透過第一線職場校長之實務面，對應實然面。(B2-1-7-12)

## (二) 隸屬教育部下欠缺自主性

各國「國家級」教育智庫依其屬性之不同，可分為獨立運作之機構，如紐西蘭、英國；隸屬於大學院校內之獨立組織，如新加坡；直接隸屬於教育部者，如巴西、日本、美國（陳榮政、楊振昇，2013）。其主要任務為進行教育領域相關研究、教育資訊蒐集與提供教育政策制訂者建議等，故政府應與教育智庫保持良好互動關係，透過定期開會討論，發揮智庫影響力將研究成果應用轉化。反觀我國，由於我國國教院之定位，其重點大多在執行教育部之交辦事項，因此研究自主性受限。

我們一直以智庫自稱，但問題是目前多為教育部直接指派研究，當研究人員都忙於指派的研究時，就沒有太多的時間與機會做自己的自主性研究。(A1-1-24~26)

國教院目前還無法成為一個前瞻性智庫，最主要原因之一是自主性較低，且長期性的政策研究比較欠缺。(A2-1-4~5)

基本上，就我國目前情況來看，我國教育智庫之角色為行政支援，即當教育議題發生時，上級單位才開始委託學術單位進行研究，但實際上智庫之功能，應是針對國家未來教育發展趨勢進行長期性、系統性，以及整體性之研發成果作為決策支援才是最佳作法，對於未來國家教育施政品質的提升必然會有積極正面的效應。

我可以說我們的角色是在尋找答案，目前為止，我們很難指出未來國家教育 5 年、10 年的方向，這才是我覺得的智庫，指出趨勢、不足，或者是要怎麼做，需有什麼預備，不能一直停留於現況。(A1-2-5~7)

目前與教育部之共識，前瞻性研究占 50%、政策性研究 25%、自主研究只占 25%，各類定義由教育部決定(75%)，因必須因應政策，故院內較難有長期性研究。(A2-1-35~37)

作為我國教育智庫的國教院，目前定位為公務機關，隸屬於教育部並作為教育部之學術研究單位，除自主性受限外，智庫之中立地位與獨立性尚有發展空間，如：發表研究與公開言論時需經過主管單位同意，易被視為是替教育部背書是我國智庫無法發展成熟原因之一，若以「思想工廠」作為智庫之比喻，智庫即是決策者的智囊團，提供政策諮詢、政策建議則是其功能。

由於受限於教育部之隸屬，國教院提出公開言論或發表著作時，都須經過教育部同意，這個在學術研究機構中有時會有困難。(A2-2-2~3)

公布任何數據也都需先經教育部同意，此為我們現在最大問題，若無法改變現狀，我們仍無法成為引領政策變革的智庫，。(A2-4-14~16)

### (三) 例行性與任務性研究影響中立地位

就我國目前國教院運作情形，尚稱不上是中立的智庫，由於其隸屬於教育部，自主性受限，進行之研究也多為任務性與例行性的行政支援，長期性與系統性之研究則較缺乏，故國教院欲實現智庫「創新理論、參與決策、引導實踐」之精神尚有努力空間。

國教院無法作為研究型智庫之原因有：行政業務繁雜、缺乏長期性及系統性研究，大多是任務型、政策型居多。若要成為智庫，應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並且是常期性、系統性的研究。(A2-1-4-6)

當部長說我們是智庫時，他會希望說你要幫我找問題的答案，但這比較像是委託型的智庫，是當他們遇到問題時，我們要趕快給他答案，我們做的不是可能會發生哪些問題給教育部建議，我們大多都是支援居多。(A1-1-29~31)

由於例行性與任務性研究過多，造成研究人員從事之「行政」業務過多，與其原先期待不符，加上國教院進行之研究多為上級單位所指派，使其從事之研究大多不能進行發表，綜合上述原因，不僅使研究人員之研究領域受限，亦造成院內研究人員流動比率高。

為何研究人員流動率高，因(1)在國教院內從事之研究不符合研究人員原先期待，目前院內工作許多為行政性質，(2)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室想透過研究累積加以升等，理想情況當然是希望能自我期待與國家期待，但明顯現況是，由於目前從事研究多不能投稿發表，亦無法符合其升等期望。(A2-2-12~16)

照理來說，國教院應較大學工作穩定，但發展受限其流動率高之原因，例行性行政事務過多，對未來生涯規劃發展無益，是最大問題。(A2-7-6-8)

## 三、就智庫產出與教育行政之應用而言

### (一) 現行行政指導政策研究仍無法避免

國教院是隸屬於教育主管部門的教育學術研究機構，本應發揮其專業性提供主管部門政策建言，但就現況而言，卻淪為任務性的行政救援，由於任務型研究過多，易造成院內研究人員無法突破現況以精進專業研究能力。受訪者均表示目前研究多受限於上級主管單位，使學術及專業導向的智庫在研究之自主性或客觀中立性上受質疑大眾信賴，亦減緩智庫對政策歷程的貢獻。

目前國教院研究會受到教育部指示，或是研究結果要向教育部報告，顯然此種作法缺乏智庫之獨立性跟超然性，真的是兩難！（S1-1-7-8）

現在教育部之研究都是以行政委託、指示、協助下放國教院辦理相關研究，因此國教院無法發展自主研究。（A2-4-36~38）

教育部心目中的智庫，是當他們遇到問題時，我們要趕快給他答案，我們做的不是可能會發生哪些問題給教育部建議，我們大多都在救火。（A1-1-30~31）

由於台灣政體影響，形成執政黨之偏好會影響其教育的看法，如：教材選用之文言文比例。作為教育智庫，若教育政策智庫能增加其學術專業性、廣泛性，則研究之結果能中立的供不同執政黨加以執行，也才能徹底發揮智庫功能。

若談及中立，會涉及執政黨對於教育基本盤，即意識型態，對於教育政策的看法或對事件之價值觀的切入角度會不同，因此執政黨的偏好月時會影響，先前的爭議媒體已有很多報導。（A2-2-2~3、5~6）

## （二）重要與大型研究仍以與大學院校合作為主

智庫應屬於一種研究機構，和一般高等教育機構的差別是，智庫既沒有學生，也不提供課程，著重於公共政策事務，因此和政府有密切的合作關係，透過專業研究，提出政策分析與建議以影響公共政策。一般高教機構大多從事為學術型之研究，而國教院則是任務型，兩者若能相互配合，形成合作機制，能達相輔相乘之效。目前許多研究仍是由大學院校進行，使智庫失其功能，若未來分工上可改善，改由國教院擔任主持人，統籌研究之進行，而各大專院校協同研究，各司其職之下，才能提供政策更具體之建言。

我覺得國教院事實上應該要去做傳承的角色，坦白說我們之前跟許多大學合作結盟，但是我覺得沒有一個 concrete 的合作機制出來，那個部份我覺得是比較可惜的。（A1-8-35~37）



台灣目前在教育政策研究另外一個挑戰是，教育部現在看來似乎一些重大的政策研究案都委託大學來做，譬如說某大學從事師資培育研究，一些大學做入學考試制度，或是實驗教育等等，都是委託大學來做，重要政策都分散開來了。(B1-2-27~29)

作為「國家級」教育智庫的國教院，應充分展現其與一般大學院校不同之研究功能，發揮諮詢性、決策性以及評估性之功能，例如：分析我國教育整理趨勢，列出未來發展議題，若偶遇突發性事件或需特定領域專家，則可請求大專院校協助，雖智庫不是達成政策品質改進的唯一管道，但在研究結果傳播應用、政策告知上，卻有其他管道不及之長處，是值得努力之方向。

把所有該做的研究議題弄出來，然後國家研究院負責國家層級的，其他可能就由各大學負責。(A1-2-34~35)

定期出版教育改革報告書，分析我國國內教育趨勢或現象，列出每年常發生之教育議題並將之列為長期性之研究，此為一般大學院校研究工作較難著墨，是國教院應努力之方向。(A2-1-13~15)

我覺得教育政策智庫的產生，應該是為整個教育政策做一些諮詢性、決策性、甚至評估性的一些功能，那大學能夠做的只是平常可能突發性或者需要某些政策專長支援的時候，請一般大學來做，那一個有制度且隸屬在教育部底下的教育政策智庫，我覺得應該是要負起整個政策諮詢、政策研究、還有政策評估，這樣子的責任，不應該是由其他大學來主導。(B1-2-29~34)

### (三) 以科學研究為基礎的教育行政仍難達到

由於國教院是由國立編譯館、教育資料館以及國家教育研究研究院籌備處三合一整併成立，此種合併而成的機關，易產生組織調適的問題，而上述三個單位原不是研究性質的機關，組織文化及原有人員也不以研究成果為宗旨，因此可知國教院之研究人員比例仍待補強，故欲達成以科學研究基礎的教育行政，以促進國家教育，尚有努力空間。

當初成立時，主事者想要讓研究人員和行政人員之比例為 2:1，現在大概是 1.5:1，目前行政任務過多，因此需大量利用行政人員才能支撐，以七個中心來看，純研究中心只有三個，研究人員加起來不到 50 個，其他都是行政中心。(A2-6-11~14)

## 四、就智庫之國際化與競爭力而言

### (一) 宜主動建立區域合作網絡

國內教育研究不乏研究的議題，但多由個別學者或個別研究團隊完成，導致零散且常發生重疊之現象，由於甚少由政策角度思考並轉化研究成果，使得統整性不足。這種「有智無庫」的情況若能改善，集結跨領域、跨學科專家的力量，在研究之外更向前跨一步，由較統整多元的角度提出政策分析，當可發揮研究成果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就目前議題的整合、實際的執行上，因為研究人員數量有限，不可能每個議題面面俱到，因此透過跨領域或跨學科的網絡，譬如納入經濟學者或人口專家，可達到較全面性之研究。

由研究院和相關大學或關心教育的人，每 5 年開個 forum，討論未來 5 年計畫，然後把所有該做的研究議題弄出來，然後國家研究院負責國家層級的，其他可能就由各大學負責，最後出一個 5 年白皮書，而這裡頭，為什麼我說不只有國家教育研究院來做，因為我把所有教育學者都納入，可能還包括經濟學者，大家一起討論重要議題，我覺得這才叫是智庫。(A1-2-33~37)

除國內之跨學科研究合作不足外，我國在國際連結也尚缺乏，觀看先進國家，如：日本、新加坡、韓國，其不乏有專責單位負責國際連結推動，亦透過期刊發行，供不同學者互動交流的機會，藉此能夠提升教育智庫之研究能量，近而帶動智庫之國際競爭力。

我們現在國家教育研究院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們國際連結不夠，我們看很多先進國家的一些教育政策智庫，他們都有各自的國際連結，甚至有專責單位來負責國際連結，譬如說：跟我們很近的日本，文部省的教育政策研究所，以及新加坡在南洋理工大學裡面的教育研究院，他們除了有自己的刊物外，也成為區域性的連結中心。(B3-2-1~4)

韓國的教育開發院 (KEDI)，有自己非常高水準 SSCI 刊物之外，也有很好的國際連結，一方面藉由發行刊物提升研究，二方面藉由發行刊物來連絡相關研究背景的國際政策或資料庫負責人或學者，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B1-2-5~8)

### (二) 以參加國際資料庫建置與分析方式進行長期政策追蹤

藉由國際資料庫之建置作為政策之長期追蹤，可深入了解政策實施情形，如由 OECD 主導之 PISA 與 PIRLS 等國際測驗，透過多個國家參與，為各國相關政策分析與評估提供優質的資訊，因此藉由國際組織主導國際智庫之建立，可供跨國比較與連結，以促進國際接軌。

我們現在也看到一個國際趨勢就是，越來越多國際組織來主導一些國際成就測驗，還有教師專業發展，譬如說我們熟知的 OECD，對學生有 PISA、PIRLS，對老師最近有 TALIS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B1-2-14~16)

然而，前述提及我國教育智庫在經費上較有限，因此在推動參加國際資料庫勢必較欠缺，若我國未來能積極規劃系統性地參加國際資料庫，藉由長期追蹤方式，必能提供我國教育政策、評估或給政策制定者參考，提升我國教育發展之品質。

那我們看到很多國家都是從政策的角度來請一些智庫或是教育部來直接主導，投入大量人力與經費，我們台灣如果要跟國際強調連結或接軌，這部份是我們未來要去重視的，可是我們現在做國際資料庫或長期追蹤的時候，可能礙於經費的關係，我們就是沒有辦法有系統性的規畫，這個部份相較於其他國家我們是比較欠缺的，也是台灣未來去發展有系統地教育政策、評估或給政策制定者支持，我們是還需要再努力的。(B3-3-5~12)

### (三) 建立國際教育政策智庫排名機制

市場概念和市場化議題在教育研究中已盛行，作為教育發展理性化和重視經濟價值的推動力量，並強調以績效檢視政策執行或資源分配之情形。舉例來說，如大家熟知的《QS 世界大學排名》，即是高等教育市場化最佳寫照，即學校與學生可透過大學排名作為評價依據，因此教育智庫未來若可朝發展與大學排名類似之機制或指標，勢必能藉由評比帶動教育智庫之發展。

當 QS 對大學、對高等教育機構排名，越來越讓這個領域的人去覺得是根深蒂固沒辦法撼動的價值之後，是不是我們也可以藉由在整個國際政策智庫作一些排名，然後仿效高等教育機構排名指標或是類似向度，來針對好的一些教育政策智庫作一些評比，這是我看到未來可能會產生的現象。(S1-2-29~32)

QS 對高等教育一直非常熱衷，那也積極去拓展各式排名，他就會去思考

到政策智庫研究似乎也是在高等教育理面，那他們好像覺得是不是這個領域可以去作一個比較有系統性的排名，也許不一定是 QS 主導，但是 somehow，這個聲音越來越多人提出來，那在可預見的未來，可能政策智庫也會面臨一個排名的壓力。(B3-2-34~40)

然而，教育領域市場化已成事實，我國除應跟上國際趨勢外，亦應作出準備，而本研究也試著發展一些向度與指標，希冀未來供政策制定者參考，若未來實施排名，雖我國或許遠落後於其他國家，但不妨可透過此劣勢去爭取投入，化為轉機。

那台灣呢？我們不能置外於全球跟世界，假設整個世界的趨勢是一條線畫出來，我們是要跑到線的外頭，還是要在線上去跟上所以我們去做一些配合，那從這個角度來看，可能我們去正視，而且預先去做準備，一些大家比較會看重的一些向度內容或指標，以免萬一大家說，我們要做國際教育政策智庫排名的時候，我們沒有東西可以提供。(B1-3-1~8)

## 陸、結論

本研究認為，我國國家教育研究院目前在定位上僅能稱是委託型的智庫，相較於附屬於大學的研究機構或是中研院等研究型智庫，或是能影響政策制定的倡導型智庫，從本文的研究發現來看，尚未做到多功能的地步。在綜合的發展上，本文有如下之結論：

### (一) 就智庫本身性質而言，國教院尚須努力在教育專業中建立其號召力

目前在體制上國教院隸屬教育部，為二級單位，從受訪者訪談內容表示，由於其隸屬關係，不僅經費自主是一困難，研究自主性亦受限，因其所從事研究大多為教育部委託，故無法發表與教育部見解不同之政策進而與教育部提高互動。本文認為若未來國教院可朝定期召集主要政策制定者、各領域專家學者及各利害關係者開會之方向努力，形成討論國家長期教育發展的機制，不僅發展政策具全面性、整體性，亦能徹底發揮研究成果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

### (二) 就研究表現與品質而言，尚待發展前瞻、整體與開創性的政策研究

就國教院現況而言，由於任務型研究過多，使其淪為行政支援，故院內研究人員無法突破現況以吻合其專業研究能力，形成研究人員或有出走大學、無法留住優秀人才之局面。此外，目前許多研究仍是由大學院校進行，使智庫功能不彰，未來

分工上應改由國教院擔任主持人統籌研究之進行，發揮諮詢性、決策性以及評估性之功能，各大專院校則協同研究，才能提供政策更具體之建言以發展生產高品質、嚴謹且政策導向的研究。

### （三）就研究結果與政策影響而言，仍待後續評估

本文發現目前國教院之研究多受限於上級主管單位，使學術及專業導向的智庫在研究之自主性或客觀中立性上受到若干質疑，亦減緩智庫本身應扮演的對政策歷程的貢獻。本文認為良好的政策制定有賴於從各種研究方法中採集證據，研究結果最重要之一環即政策建議是否是被政策制定者、政策行動者採用，而我國目前現況，智庫之研究結果只能被動地在設定框架內從事符合政府構想之研究，甚少進行雙方溝通協調。因此，雙方關係若能加以改善，由智庫撰寫構思專業研究，政府端收集民意，如此一來，提出之政策建議才能符合社會期望。

### （四）就研究結果傳播而言，努力拓展學術研究國際化

若前述提及之智庫定位以及與行政部門互動之關係機構穩定後，在來即是觸及國際化程度，本文研究後發現，國教院在國際化與跨國研究部分仍有發揮的空間，其原因之一為受限於僵化之公務體系，加上公務基金較少，使得國際交流機會下降。故未來在相關資源的連結與籌措上，應有完整之計劃，以提升我國研究人員學術能量、促進國際連結。除此，由於市場化、國際化已是現象，然而我國由於參與國際組織之經驗尚待累積，在參與國際資料庫、國際測驗之主動性尚待加強，未來則應系統性規劃並積極參加，藉由長期追蹤方式，必能提供我國教育政策、評估或給政策制定者參考，確保教育研究的無國界發展。



## 參考文獻

- 王麗雲 (2006)。智庫對教育政策歷程影響之研究。《當代教育研究》，14 (3)，91-126。
- 陳榮政、楊振昇 (2013)。美國、英國及新加坡教育智庫之運作與績效評估分析。《教育政策論壇》，16 (3)，65-95。
- 潘慧玲 (2004)。質性研究典範對從事教育研究的啟示。《教育研究月刊》，116，16-21。
- Cahill, D. (2013). Ideas-centered explanations of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A critiqu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1), 71-84.
- Clarke, M. (2012). Talking about a revolution: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fantasmatic logics of education policy.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7(2), 173-191. doi:10.1080/02680939.2011.623244
- Cornish, L., Minichiello, V., & Phuong, N. (2014). Management, leadership and change: Views from rectors, vice-rectors and academic staff in Vietnam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3(1), 69-77.
- Denzin, N. & Lincoln, Y. (2000). The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 Y.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1-29). London, U.K.: Sage.
- FIER (2014). *FIER brochure*. Retrieved from [http://ktl.jyu.fi/img/portal/13640/FIER-ESITE\\_08.pdf?cs=1224753163](http://ktl.jyu.fi/img/portal/13640/FIER-ESITE_08.pdf?cs=1224753163)
- Funke, J. (2013). Human problem solving in 2012. *Journal of Problem Solving*, 6(1), 2-19. doi: 10.7771/1932-6246.1156
- Gerrard, J. & Farrell, L. (2013). Peopling curriculum policy production: Researching educational governance through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nd Bourdieuan field analysis.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8(1), 1-20.
- Glatter, R. (2014).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1969-2014: Reflections on pragmatism, agency and reform.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History*, 46(3), 351-366.
- Guzman, A. (201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frankenstein problem.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4(4), 999-1025.
- INRP (2014). *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pédagogique*. Lyon, France : INRP.
- Jacobsen, R. (2009). The voice of people in education policy. In G. Sykes, B. Schneider & D. Plank (Eds.). *Handbook of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pp.307-318). New York:

- Routledge.
- Law and Social Justice*, 5(1), 11-26.
- Levin, B. (2010). Governments and education reform: Some lessons from the last 50 years.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5(6), 739-747. doi: 10.1080/02680939.2010.523793
- Lewison, E. H. (2013). Consuming development: Responsibility, citizenship and the corporate university. *The Canadian Geographer / Le Géographe canadien*, 57(3), 363-371.
-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cGann, J. (2012). *2012 Going to global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Philadelphia, P.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Mishra, P. (1977). *Society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UK: MacMillan Press.
- Moyo, N. & Modiba, M. M. (2013).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al reform: Policy networks in policy-making in Zimbabwe, 1980–2008.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8(3), 371-385.
- Patton, M. Q.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 & evaluation methods*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Peters, M. A. (2013). Manageri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Prospects for new forms of “open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 Shiroma, E. O. (2014). Networks in action: new actors and practices in education policy in Brazil.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9(3), 323-348.
- Thunert, M. (2006). The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ink tank in Germany. *German Policy Studies*, 3(2), 185-221.
- UNESCO (2011).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SD)*.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esco.org/new/en/education/themes/leading-the-international-agenda/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
- Weaver, K.R. & McGann, J.G. (2000).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Catalysts for ideas and acti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Weaver, R. K. (1989).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2(3), 563-579.
- Wiarda J. H. (2008). The New Powerhouses: Think Tanks and Foreign Policy. *The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30(2), 96-117.

